



吐延晚黛 栉风沐雨

——忆陕西省延川县老书记申易（四）

□ 黑荫贵

申书记与办沼气

1974年初,《人民日报》对四川农村推广沼气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他把想法告诉了当时在县上的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两人不谋而合。于是向县委汇报,申书记很重视,决定抽调3个公社(城关公社、文安驿公社、关庄公社)的6个同志去四川农村学习办沼气。当时我和习近平就在张之森的带领下,跟着代表团到四川学习。1974年底,在四川省委的安排下,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参观学习,取得了许多办沼气的办法经验。从1975年3月开始,3个公社的3个试点分别开始了建沼气池的试验。经过不断努力,终于让第一口沼气池产出了气,点成了灯,做成了饭。申书记也来到现场观看,并决定在县里成立沼气办,统领全县沼气工作,并在两个试点队组办沼气培训班。于是各公社的学员自带口粮,奔赴关庄大队、梁家河大队,在四川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力争在3个月内实现两村农户80%建成沼气池的任务。这样,一场大办沼气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申书记也经常跑来帮



▲ 申易(右五)与知青在一起

助解决困难和问题,1975年7月,陕西省农村办沼气现场会在延川召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池也能发电”“点灯、做饭、蓄肥”这样的消息传遍全省。延川县集中骨干力

量,试点培训骨干,边学边干的一整套办沼气的经验传播到全省。

在大办沼气的运动中,申书记以他的魅力和胆识,把一场影响农村面貌的工作推动起来,创造了政府集中

力量办大事,以点代面,以出民工培训技术的方式,使一场办沼气的运动迅速推开。仅一年间,延川的沼气池就全面铺开,老百姓在家中用上了照明和做饭的沼气能源。新事物,新体验,新成果,为延川农民点亮了生活变化的信心。

让人不能忘记的那些痕迹

我的青春岁月,基本上都是在陕北农村度过的。从一个知青到农村干部,在农村摸爬滚打了10年光景。特别是三变五翻以来,延川的巨大变化更是让我记忆犹新。申书记的奋发有为是延川产生巨大变化的核心力量。

要知道那“长龙一号”谷子、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川地密植就发生在那个年代。县上组织农村技术人员去海南育种,把杂交种子带回延川试验推广,才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

要知道延川那几年修了三座大型水库,建了几十个淤地坝,修通了通向各公社的道路,这是多少心血的结晶。

要知道延川《山花》这朵奇葩,曾是当时全国文艺界多么耀眼的一支山花,培养出了一大批农村文艺青年。

要知道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农村医

疗站,在申书记的支持帮助下,创造了多少奇迹,挽救了多少贫下中农的生命。

要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的成长和成就,有老书记在背后的推动。

要知道北京知青中有多少人入党、提干、当教师,以至成为典型的过程中,申书记不遗余力信任、关怀、培养,给知青创造一切条件。知青的成长离不开老书记的呵护和培养,是他让知青投入到延川的建设事业中。他对知青的每一点成绩都及时地给予表彰。可以说当年的延川,北京知青已是一支生力军,在各条战线上都有北京知青的影子。

要知道我们延川的孩子,他们地道的北京话至今仍是一道风景。好学习上进已在北京知青教师的影响下,传到今天。

要知道在那艰苦的年代,延川的文艺活动在北京知青的参与下,曾经风生水起。延川道情、延川秧歌,曾经在广阔的黄土高原作为鼓舞人民的有力武器。

要知道这些历史的时代脉搏是在共振下发生的,是梦的承载,必是梦的见证。

“物而默契神合,造化与心流相

遇”,习近平的“功深唯志,业广唯勤”对脱贫的锲而不舍,路遥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和那“就盼那一片片绿,就盼那一缕缕泉”的呐喊,史铁生对生死不过是一次迁徙的世界观和《遥远的清平湾》诗意、智慧、安详的思考力量,都离不开延川这片神秘的土地。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隐藏着一个世界。我们的申书记就是在那段岁月中身体力行的人,从容、智慧让人释怀。黄土地捧出的颗颗黄土能嗅出国家记忆,它让人的生命更有意义,特殊而有印记。延川的过去和未来一定会有它历史的关照。而在这期间,我们当年的北京知青把无数的浪漫变成了自由的释放,变成了自在的生活,也成就了那几个人宣称的“知青文化”。我们参与并融入了陕北农村的变革,认识了农村真的现实,而注定让这份农村情怀铭记心间。而申书记当年的精神飞扬,横黛吐延河的岁月沧桑,更是历史给予的最大关照,也是北京知青的造化。

(全文完)



《石灰吟》中的君子之风

□ 胡海升

500多年前的明朝有这样一位文人,他仰慕南宋末年文天祥丞相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他面对凶残的素有反叛之心的王爷,怒而直面其过;面对权势滔天的宦官,也决不贿赂巴结,以至被诬陷几乎死于狱中;他曾怒斥逃跑怯敌之举,整饬兵备,部署要害,固守北京城,使大明朝免于灭亡;他常以石灰自喻,恪守家风,两袖清风,严格教育子女,使后世子孙品德上从未有缺。他就是大明朝的擎天白玉柱,与南宋岳飞、明末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的兵部尚书——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代表作《石灰吟》。这首诗以象征的手法,借石灰喻人,表现了他高洁的品格。这首诗也是于谦一生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他终其一生而不改的君子之风。君子之风,于个人即为良好的作风;于家庭即为严谨的家风;君子以类聚,于政即为明

朗的政风;天下以类聚,于社稷即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之风。

兴利除弊 能臣作风

探究于谦君子之本源,当从其祖上的家风谈起。于谦祖上皆为官宦,素有贤名。其父于彦昭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的读书人,他正直而忠纯,深恶官场的黑暗,故而隐于家乡钱塘而不仕,专心教育子孙。于彦昭的家风,深深地影响了于谦,使其受益终生而青出于蓝。

于谦二十出头即中进士,而立未至,即受皇命直斥汉王朱高煦,正义之言,发自肺腑,声色震厉,使朱高煦惭愧之至,伏地战栗。于是龙心大悦,擢于谦巡按江西,于谦于江西公干中为民清命,平反冤狱,累计有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委于谦以重任,迁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骑马轻装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与父老亲切交谈,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项,多次上书朝廷;遇水旱灾害,马上如实禀明,以尽快组织灾后救援。正统六年(1441年)上书为府州县的下等民户,在青黄不接之时,争取一定份额的粮食,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宣宗深以为然,下令照此施行。于谦令各州县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负责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口渴之苦了。另外,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流传甚广,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

为官清廉 两袖清风

正统年间,太監王振深得英宗器重,权势熏天,揽权纳贿无所不用其极,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唯独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更谈不上贿赂王振。而当年拥立明代宗朱祁钰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君子之风,起于良好的家风,成于严谨的作风,以清风正气为其基石,升华为保卫祖国的国土之风。这正如《石灰吟》中的石灰,深山是其本源,千锤万凿而养成作风,清白为其品德,最终升华于烈火焚烧。纵粉身碎骨,亦不改其志……

书,方使王振不得不刀下留人。几经波折,于谦做了知府,前后在任共十九年,清廉之名远播海内。

保卫京师 国士之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犯,英宗受宦官王振的挑唆,不顾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的极力劝谏,决定御驾亲征。行军中,王振多次擅改路线,并邀英宗临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兵追至,50万大军全军覆没,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当此之时,大明精锐多失陷于土木堡,京师仅余不到十万老弱士卒,虽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但似有群龙无首之势,朝廷之上,迁都之声有之,投降之声有之,无助呼号之声有之,百姓人心惶惶,北京似不可守。但于谦以兵部尚书之职审时度势、力排众议请郕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使京城兵力达到20多万人,安定了人心。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开门拒拒,于谦等大臣拥立郕王为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粉碎了也先以英宗为要挟的阴谋。也先无计可施,下令强攻北京城,于谦遂率军于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今广安门)等地,屡败敌军,迫使也先军退回塞外,京师转危为安。

北京保卫战仅5天即取得了胜利,离不开于谦坚定的抵抗和战争的智慧,他能在纷杂的斗争形势中,抓住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要矛盾。于政治而言,奇货可居的俘虏英宗是也先的王牌,于谦等有识之士能够“重社稷、轻君王”,果断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使也先的王牌毫无用处,于政治上变被动于主动,可谓北京保卫战胜利的关键之一。应该这样说,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于少保,真是国士无双!

然而,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为于谦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也先有此一败,英宗已经失去了作用,遂将英宗放回。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正月重登帝位。而当年拥立明代宗朱祁钰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君子之风,起于良好的家风,成于严谨的作风,以清风正气为其基石,升华为保卫祖国的国土之风。这正如《石灰吟》中的石灰,深山是其本源,千锤万凿而养成作风,清白为其品德,最终升华于烈火焚烧。纵粉身碎骨,亦不改其志……

文艺评论

流行音乐中的诗意

□ 顾超

《诗经》中的诗原本都是配乐的歌词。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在听了《邶风》后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如今读之依然令人神往。而在西哲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三种: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哲学的生活。在他极为渊博的著述中,很多地方提到的哲学其实不仅是狭义的理论思辨或形而上学,其意多在于音乐与诗的有闲教养。可见东西方文化差异虽悬殊,在轴心时代前后对诗与音乐的审美情趣却相差无几。从两千多年前穿越到现在,细细品味当下一些优秀的流行音乐的歌词,也颇有文学性。

李宗盛的《山丘》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男人的浅吟低唱。涓滴意念汇流成河的修辞预示了人生的难,但人生究竟难在哪里呢?“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听到这里于是恍然了悟,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隐喻,人生总要翻过一个一个山丘,就像西西弗斯每天推着巨石上山,又看着巨石滚下。悲观的人会说:人生只是这种没有意义、永不停歇的重复;乐观的人则会说:幸好人生本没有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李宗盛的歌词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却并非悲观和虚无;有着逝者如斯了无痕的通透,却又不是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对半生的悲喜回忆让人动容、遥想,却不至于仰天长叹、痛哭流涕;情绪的表达是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来的,却又不是喷薄而出的激情,而是带着一点收敛的节制。这种欲言又止的感觉和余韵悠长的回味,是一个经历过漫漫坎坷人生路的长者带给我们的艺术沉淀。

董玉方作词、李健改编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则是以叙事抒情的典范。整首歌用词朴实无华,仅仅是对普通生活场景的白描,“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东邻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了/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涤卡上衣/痛在心里钻/蹲在

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在一首歌曲极为有限的长度中用叙事的方式铺陈情绪,本身是非常困难的。但就是这么普通的词句,几乎没用任何修辞,却能引发我们浓烈得化不开的感情,为什么?因为叙事的意象带来了很强的共情。露天电影、缝纫机、饼干、蓝色的涤卡上衣很容易把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们带回那个物质匮乏却又单纯质朴的年代,再经过父亲的日记这一载体,每个人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自己的父母形象、回忆起那些平凡却饱含深情的日子。李健的修改也可谓是神来之笔。原诗“那上面

的故事/就是一辈子”始终只是一种个人的叙述,而“这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几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它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则升华为一代人的爱与哀矜。歌词对共情的运用让我们眼中含泪,直击心灵的最深处。

剥开这些流行音乐的华丽外表,里面呈现出的是诗的内核。似乎又让我们穿越回了两千多年前,跟着苏格拉底一起观看酒神的狂欢,与孔子一起咏而归。那就让我们去过这样一种音乐的、诗的、哲学的生活吧。



岁月静好 阳光 / 摄

